

薪火相传的文化之根

袁济喜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的文化传统是在洪荒年代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中萌生的，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意蕴与历经沧桑而不泯的血脉，植根于黄河、长江流淌滋润的农业文明大地之上。《易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与中华之魂的写照，也是今天中华复兴、建设世界文明的火炬。

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于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中华疆域东临太平洋，北靠茫茫戈壁，西濒高山雪峰与万里荒漠，西南则耸立着青藏高原。处于这样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便自然而然地具有其封闭与独特的一面，因而它的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

中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从目前考古学上发现的中国猿人的一系列遗址上，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过从文化人类学上直接回溯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遗迹。它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母系氏族时期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此外，还有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等。

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依赖天时地利来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又是十分原始的，面对的敌人也是空前强大的。从《周易》的内容来看，先民们生活的这一带天气变化无常，洪涝旱灾时常发生，它无情地侵袭着人们，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与猛兽野兽袭击人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编著的《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燬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耄民，鸷鸟攫老弱。”这里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洪荒年代，地震频发，山火猛烈，洪水肆虐，猛兽与恶禽扑食人类，人类是多么哀哀无告，然而又是多么艰难地与自然界作斗争，以争取生存呵。

这种艰苦的劳动与生活条件，造成中华民族比较务实的性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说到，中华民族因为生存之不易，故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重实际，轻幻想。中华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世俗文化，乐天知命，生生不息。

在远古洪荒时代艰苦而恶劣的环境中，先民们依托氏族血缘关系，筑成集体堡垒，以抵抗自然力量的侵害与外族的侵犯。基于生存的需要，中华民族很早就懂得了人人相和对于集体生存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常说的“和谐社会”，我认为其实也是导源于先民的生存环境中。孔门弟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这里所说的“先王之道”与其说是个别圣人的说教，毋宁说是远古生民的共识。中华文化之魂就是由这种血缘形态与观念建构而成的。

文艺美学的血肉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

张 晶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问题，我一直是萦绕于心的。这些年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同仁们，提出了诸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类的问题加以讨论或争辩，可见大家的困惑是同样的。这并非是什么新的问题，却在新的语境下不断地被追问，也就是说，其间仍然是有颇为迫切的现实需要的。

笔者近年来每年一轮为艺术类的研究生讲授《文艺美学》课程，又写了为数不少的文艺美学论域中的文章，渐次对文艺美学有了一些体会，忽然觉得对于古代文论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没有必要为古代文论的前途或命运怀着“中心摇摇”的殷忧。因为在中国文艺学理论的众多成果之中，时时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子。“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这个被杜书瀛先生亮出的旗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怀疑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它经过这近四十年的建设，有了那么多自觉建构的理论成果，仅是以“文艺美学”命名的专著或教材，也在十部以上吧。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想要对它视而不见，也难！

文艺美学在中国被提出，在中国的文化根基中生长，在某种意义上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文艺美学介于美学和文学艺术之间，研究各门类之间一些共同的审美规律。文艺美学在框架上固然有足够的哲学美学的笼罩，但又有着明显的经验层面作为学科基础。中国古代文论(我这里将传统意义上的文论即文学理论，扩展为文艺理论，将画论、书论、乐论等纳入其中)留下了那么多的论著、范畴和命题，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内涵中是难以取代的，它的当

我们探索中华文化之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灵魂不死的观念到了仰韶文化阶段趋于成熟。在最早的山顶洞人时期，我国的古人类就已经萌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到了仰韶文化阶段，这种观念就更加明晰了，并且成为普遍的观念。仰韶文化遗址中的死者墓葬的头颅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象征死者生前同心同德，死后也魂归一处，决不分离。战国时著名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招魂》中有“魂兮归来，反(返)故居些”的哀辞，《楚辞·九歌》中的终曲是《礼魂》，表达对于魂灵的礼赞。远古人们敬畏魂灵的观念，反映出氏族社会中血缘关系对当时人生死观念的约束，同时也说明了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对生死归宿的关注。

与此相适应的则是图腾观念的发达。墓葬反映出人们对自身归宿的关注，图腾则说明人们重视自己的来源。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开始探寻本氏族的来源，说明原始人已开始对自己历史的关心。几千年来备受华夏族尊崇并成为帝王标志的龙，考其渊源，也是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图腾观念以及后来出现的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意识，而这种具有文化意味的自我意识，正是中华文化成熟的标志，是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础。《论语·学而》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慎重对待亡灵，追寻远祖，老百姓的道德就会变得厚重。孔门的这些经典语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敬天法祖的心理。

近年来，每到清明节，我们本着珍爱生命的观念，悼念身边死去的亲人，追思那些亡故的同胞，怀念先辈；同时，尽情享受春天生活的明媚阳光，感怀不已！这几年国家将清明在内的传统节日列入法定节日，就是对于我们先祖的追怀与祭祀，它既是

传统的回归，也是对于明天的进步，古人说：事死如事生。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不敬重祖先与传统的民族能够创新与发展。现在人们言必称创新，但是创新如果没有人文传统与人文情怀，则很可能变成乱来！

比如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所以我们清明节祭祖，首先要公祭这两位先祖。关于炎黄二帝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在《逸周书》、《国语》、《周易·系辞》等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相传炎帝神农氏率领其部落始做耒耜、教种五谷，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倡交易，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炎帝为民采药治病，来到南方，因误尝断肠草，“崩葬长沙茶乡之尾”，炎帝墓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黄帝则率领其部落养蚕治丝、始做衣裳，伐木构材，筑造宫室，创造文字，制定历法，并发明指南车，备尝险夷，艰苦拓殖，将中华原始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曾说：“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的原创性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审美价值。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炎帝与黄帝为代表的两古族融合发展，延向四方，后经夏、商、周及其后的发展，使中国境内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各有特长的民族、部落融为一个以中原族群为主体，包括四方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几千年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和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以炎黄子孙为荣，以同源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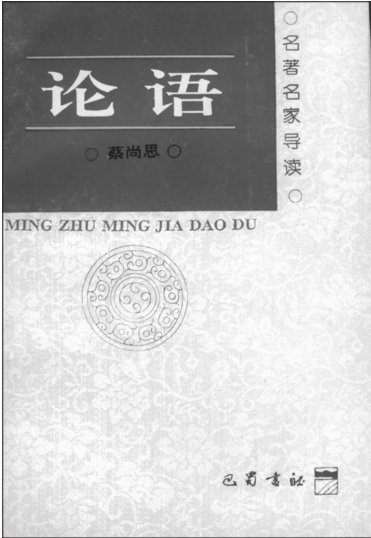
祖为亲，已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感情纽带和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传统由于具备丰厚的人文蕴含，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根脉，薪火相传，所谓中华民族，是现今由华夏族演变过来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总称。《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种说法可谓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文化的认同心态。

近代国学宗师章太炎在1907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华民国解》，其中提出：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进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孔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

章太炎的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与关注，他注重从文化去定义“中华”一词的概念蕴涵，将中华民族的根脉定位于文化传统，而种族是变易不定的，可以互相融合与变化。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得益于文化传统的薪火相传，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近代国学思潮正是缘此而振兴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高度成熟、相对独立的精神价值与物质形态的融合物，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强大凝聚力，迄今为止，华人文化成为海内外不分地域的精神纽带，也说明中华文化积数千年而成的共同民族心理的巨大能量与沉厚的潜质，这是任何民族的文化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面对天灾人祸而发奋图强、乐观向上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提醒我们，“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丧失文化，等于丧失中华民族之根。



时 评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小长假的旅游旺季里，笔者观察到许多人作别“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肤浅、疲劳之旅，寻求既轻松又有深度的文化之旅。一些景点也应时应景，纷纷发出了“提升文化味”的呼声，并出台措施强化治理。比如，日前南京夫子庙景区就开展了以“增加文气，减少商气”为主旨的“百日行动”。应当说，景区这种自我反思精神是可贵的。但笔者认为，仅仅通过“此消彼长”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味的相对提升还是欠力度的，因为这类“剥离式”处理方式似乎假设了一个这样的前提，即景区的文化味原本是浓郁的，只不过被墙外汽车排放的烟油味、闲商走贩高声叫卖的烦躁味、铺天盖地立体轰炸的广告所制造的商业味所搅和，所稀释了。

笔者认为，只有关注景区文化内涵的原生、实质性增长，才能更好地彰显景区的特色，才能让广大游客在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提高游览品质。目前，提到景区发展，动辄圈地多少亩、投资多少亿元再造个什么馆，似乎只有大手笔才能让游客不虚此行。实际上，景区的文化氛围是一种比较高尚的软环境，是一种诉诸游人心灵深处的精神力量。而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通常情况下，人们更容易接受“感动”而非高高在上的“说教”，也就是某些“众声喧哗”的景区最集中、最具文化色彩的某某馆能够“闹中取静”的原因，因此要特别注意从细小方面的巧妙处理上来提升文化味。

比如景点往往被一层一层的商圈所包围，有的从停车场到景区大门的距离竟有几里地，如果只是贩卖着任意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都能提供货源的纪念品，而在这里忽视对景区特色和内涵的介绍和渲染，无异于放弃了对游客文化感受的“预热”。同样，当游客离开时，又少了对文化感受的强化。从空间上来讲，要注重创造多重文化体验空间。如果对景物、文物所历史遗存等，只是采用“目之所及”的方式去感

观点摘编

莫忽视审美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美育在我国流传虽然有一百年的历史，但对它的认识颇有待进一步的深化，这突出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一般认为美育只是属于学校教育，而忽视它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二、通常比较看重王国维所说的美育功能的后一方面，即“为德育、智育之手段”，而对于前一方面，即“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认识不足。这样，有意无意地把美育当做只是一种辅助教育而对其相对独立性的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

近代社会是工业社会，与以简单再生产沿续的农业社会不同，它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扩大的再生产，它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利润最大化来发展动力的。这使得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重实效原则和功利原则。它极大地推动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在教育方面

由于看重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不再关注灵魂的塑造和人格的培养。鉴于近代社会人们对于教育认识上的片面性，维柯在当时就敏锐地认识到“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的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当我们竭力耕耘于科学时，却忽视了伦理学，关于人类的心智及其情感如何适应公民生活……”“它在我们的手中几遭遗弃，任其荒芜”，他还论证了人文教育在培养整全人格教育方面的重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很多人在物欲的驱使下反而变得缺乏同情心和敬畏感。通过美育培育爱的情感和敬的情感，不失为对被物欲所扭曲的人性的一种疗救。

——王元骥：《拯救人性：审美教育的当代意义》，《文艺研究》2012年第3期

动 态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30年广受欢迎

1982年问世的我国第一部科学技术通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日前有了修订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次修订版以1984年重印本为底本，由作者加以补充和修订，更新了插图，将原先的上、下两册合为一册，制为16开本。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科技史研究兴起并逐渐演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脱胎于一般的历史学，又因研究对象的特殊而具有许多独特的学科特征。早期的科技史著作内容以专门史为主，由在相应领域工作的专门家书写。七八十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与题材的拓展，跨越学科、贯通古今的科技通史读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应运而生，它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科技通史研究小组的杜石然、范楚玉、陈美东、金秋

鹏、周世德、曹婉如6位作者历经5年撰写而成。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钱三强曾评价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成就和新起点”。全书远迄旧石器时代，近至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学科门类涉及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地理、采矿、气象、医药、冶金、建筑、桥梁、造船、水利、纺织、印刷、机械等，计65万字。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王扬宗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累计印数达59500册。经过将近30年的时间，它至今仍然受到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欢迎，被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指定为教材及考研参考书，并被译为日文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我国台湾则由木铎出版社改名为《中国科学文明史》以繁体字印出。（刘茜）